

试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刘之杰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河南 焦作 454001)

摘要: 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之一, 教育性在儿童文学中的表现应该是艺术的, 是潜移默化的, 而不是单纯说教的。长期以来, 教育性在我国儿童文学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呈现多样性, 不过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应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教育性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关键词: 儿童文学; 教育性; 潜移默化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65(2003)04-0009-04

一、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

什么是教育? “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 是人类培养新生一代的一种社会实践。在教育过程中, 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计划和措施去影响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则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接受教育的影响。”

[1]

教育的目的则是通过教育, 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 养成一定的品德和个性品质, 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 发展体质和其它方面, 成长为特定社会所要求的成员。

儿童接受教育的渠道自然不止一种, 教育者施教的措施也决非一种, 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 养成一定的品德和个性品质的路子更不是一条。在诸多渠道、措施中, 儿童文学占有重要的一席。

儿童文学作家的精神产品, 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中, 或者是作家童年生活经历的再现, 或者是作家童年情结的物质外化, 或者是作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艺术表现, 概言之, 这些信息蕴涵着作家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以及他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儿童接受这精神产品的同时, 也便继承了儿童文学作家通过作品所凝结、所传递的种种信息, 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 从艺术的角度看, 我们可以认为是审美活动; 从认知的角度看, 我们称之为学习活动。用希腊儿童文学作家洛蒂·皮特罗维茨在 1986 年东京 IBBY 大会上的发言中的说法就

是: 儿童文学的功能是“桥梁”的功能, 即“沟通”儿童与现实、儿童与历史、儿童与未来、儿童与成年人、儿童与儿童之间的精神桥梁。而在这“桥梁”的诸多功能中, “沟通”儿童与成年人、儿童与历史、儿童与未来之间的联系, 这本身就是一种引导和传递。这种代系之间的传递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看作为广义的教育过程。[2]

儿童文学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儿童文学的四种功能: 审美、教育、娱乐、认知, 既有各自独立的地位和作用, 也有一个共同的特殊功能, 即从广义上说, 审美、娱乐、认知都是教育, 审美使读者感受美的同时, 使读者接受到美的影响和熏陶, 这自然也是教育, 美的训练, 就是接受美的教育, 提高审美的能力。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 儿童通过“玩”, 增进智能, 感知人生, 接触世界, 丰富情感, 健全人格, 充实生命的内容。至于认知功能更是紧密关联着儿童心灵的成长、思维的发展、经验的积累、阅历的丰富、学识的进步、眼界的开阔、素养的提高。所以说, “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 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如果要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进行界定, 比较客观准确的解释是“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不是说教, 也不是图解道德的内涵。它应该是作家在生活中获得有深切感受的人和事物, 经过精巧的艺术构思, 用生动的语言创造出来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让小读者从中得到熏陶感染,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3]

收稿日期: 2003-04-16

作者简介: 刘之杰(1957-), 男, 河南焦作人,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高级讲师。

二、教育性在我国儿童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教育性在我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受到特殊关注。教育性的特殊地位在我国儿童文学领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首先,教育性所拥有的特殊地位的原因,当归之于在我国儿童文学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教育主义”。所谓“教育主义”就是利用文学来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我国有着如同彗星一样虽然在太空中运行的轨道迥异于其他星球,但其运行轨迹却是清晰可循的。

起步于“五四”时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对于其价值的认识,在“五四”前后出现了第一次大讨论的局面。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童话大讨论”(实际上是儿童文学大讨论)。基本的观点有三种,即“民间的童话”、“文学的童话”和“教育的童话”,其中“教育的童话”的观点为“五四”前后众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所接受。20世纪20年代初,严既澄在其发表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在于“能满足”儿童的内部生活、儿童精神生命“发展的要求”和“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因而,“现代的新教育,既然要拿儿童做本位,那末,凡是叫儿童文学的,必得是那些切于儿童的生活,适合儿童的要求,能唤起儿童的兴趣的东西。”[4]这里显然把儿童文学摆在儿童教育的从属地位,是从儿童教育的角度看儿童文学的价值,这里所着重考虑的不是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审美,而在于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

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社会的特定国情出发,从阶级解放和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左翼革命文艺注重突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一面,要求儿童文学应该“给少年们的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励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富于宣传性和鼓励性的文字、插图等等样式,来形成他们先入的观念,……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5]儿童文学这种“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的价值功能的选择,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的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审美价值尺度,鲜明突出的主题,强烈的思想教育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在其作品中着力表现的。

20世纪40年代陈伯吹等提出儿童文学创作应当把文学风味和教育价值熔为一炉,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但教育性

仍然是儿童文学中首当其冲的重要属性,并没有因为倡导了文学风味而丝毫削弱教育价值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

20世纪50—60年代,鲁兵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里的“教育”内涵较之以前要丰富的多,注意到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多元化,即它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语言教育等等;并且注意到了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不过,趣味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有趣的故事使他们在欢乐中接受教育”。[6]落脚点仍然是体现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与之相应,贺宜主张“儿童文学担负的任务跟学校教育是完全一致”的,它应当“辅助学校教育,成为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全面教育的完整的系统的教育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美学追求之后,进一步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就是要教孩子们懂得他们非懂不可的事,懂得他们能够懂得的事,懂得他们愿意懂得的事,懂得可以让他们懂得的事。”[7]这段话是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选择的一个经典性的概括。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的一批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倡导儿童文学应该担负起“重塑民族性格”的职责,也即要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完成“重塑民族性格”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主义”决定了教育性在我国儿童文学中特殊的地位。整理中国近百年的儿童文学发展史,教育性在儿童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认识阶段:第一,儿童文学的价值几乎可以说“唯一”的内涵就是它的教育价值。换句话说,什么叫儿童文学?剖析“教育主义”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观,其精神实质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据此,儿童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家族的一个特殊分支,不如说是教育国度的一个基本社区。第二,教育价值虽然不能取代文学价值而涵盖儿童文学的价值,但教育性仍然是儿童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属性,或者说是最为重要的处于第一位的属性。第三,承认儿童文学的内涵包括教育性与趣味性等众多的属性,但是教育性在儿童文学的众多属性中仍然占据无法动摇的领袖地位。趣味性等充其量不过是实现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途径、桥梁、方法、手段,教育儿童才是儿童文学的终极目的、根本宗旨。总之,教育性在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长时间的处于如此显赫的霸主地位甚至至尊地位,这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三、教育性在儿童文学中的作用与局限

教育性在儿童文学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举凡益智、教化、悦情、养性、乃至审美和娱乐,其中一般都蕴含着教育性。

教育的作用是帮助儿童提升思想境界,养成儿童良好道德习惯,增长科学文化知识,开拓视野,启迪心智,健全人格,提高观察能力、计算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艺术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机智应变能力等等,这许许多多作用都可以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欣赏而获得。

儿歌是最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中数数歌是一种与数学有机结合的儿歌样式。儿童唱着数数歌的同时获得识数的教育。如“一二三四五六七, / 七个孩子答算题。 / 七张白纸桌上摆, / 七只小手握铅笔。 / 七双眼睛闪闪亮, / 七颗心儿一样细。 / 七份答卷交老师, / 七张小脸笑眯眯。 / 几个孩子答对了? / 一二三四五六七。”(樊发稼《答算题》)这首儿歌在提高儿童认识数的能力的同时,也对儿童进行了语言训练,让孩子对物量词与相关事物合理搭配的用法有了初步的认识。

儿童具有创造力,这已被大量生活事实和众多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小女孩拿起一只铅笔给布娃娃打针,一个小男孩拉着一根竹扫把当马骑,这些在成人看来似乎没有太多意义的生活场景,实际上包含了创造的成分。

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对于开发儿童的创造潜力,培养儿童拥有更高的创造力的不可替代性是不言而喻的。创造性思维品质是创造力的显著标志,求异思维、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伊索的寓言《龟兔赛跑》是各国小朋友耳熟能详的世界名作,因而,提起龟兔赛跑,小朋友便会顺着思维定势做出反映:骄傲必定失败,小白兔骄傲,所以小白兔必定失败。我国作家罗丹的寓言诗《兔子和乌龟的第二次赛跑》却反伊索原本之意而用之,别出心裁制作新声:乌龟认为兔子反正会骄傲,所以它按老经验慢慢地爬行,然而兔子已今非昔比,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一口气跑到了终点,取得了胜利。这首寓言诗的教育意义具有多重性:首先是激发了孩子们看问题不能一成不变的求异思维,同时告诉小朋友们,人们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就会取得进步,取得胜利。

有一首传统的山东儿歌《洗月亮》:“海水清,海

水凉, / 捧起海水洗月亮, / 月亮不敢脱衣裳, / 拉块云彩忙遮上。 // 羞羞羞, 脏脏脏, / 谁家洗澡穿衣裳? / 羞得月亮低下头, / 跳进海里乱晃荡。”这首儿歌的想象不拘一端,天上有个月亮,海里有个月亮,天上的月亮被云彩遮住了,海里的月亮随波晃荡。诗人想象用海水给月亮洗澡,很奇特,也很大胆,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天上的月亮,诗人想象是月亮害羞而不敢脱衣裳,想象风趣幽默,风把云彩带走了,月亮又露出面庞,并且投影在海水里,随着波浪晃荡。诗人想象是因为月亮害羞得无地自容,无法再赖在天上,所以才跳进海里,想把自己羞涩的面容彻底掩藏。想象非常微妙!以拟人化的手法把月亮姑娘的羞涩的神情描摹的惟妙惟肖。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颇能启迪儿童的发散性思维。

小读者时常从儿童文学作品中受到求异思维、发散性思维的熏陶和启迪,定能养成良好的创造性思维习惯,久而久之,必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创造能力。培根说过:“读书在于造成良好的人格。”儿童文学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对小读者的思想情感和心灵都会产生极大的感染和影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比直接的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更能有效地促使儿童健全人格的生成。

童话故事《九色鹿》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一正一邪两个形象,九色鹿不仅有急人所难的善行,更有容人所失的大度,这一艺术形象比任何劝人向善的宗教教义和教人向上的教育规范都更具说服力,相形之下,那个蒙受九色鹿之恩却引人杀之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自然令小读者唾弃。从鲜明的形象对比中,小朋友得以明辨是非、善恶、真伪、美丑,从而滋生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的美好信念。

做一个善良的人和真正的人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永远进取向上的人。严文井《小溪流的歌》是一篇文情并茂的短篇童话,小溪流不沉迷于风景秀丽的山谷,它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因而它唱着“永远不休息”的歌,冲破巨石的阻拦,顶住枯树桩的劝说,不惧乌鸦的威胁,抛下泥沙的怨恨,一往无前,不知疲倦地向前奔流!于是溪流成了小河,小河汇成长江,长江投向广阔无际的大海,大海唱着小溪流的歌:“永远不休息,永远不休息!”读了这篇童话,小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一种永远进取、永远向上的精神力量,也会体悟到只有从小定下人生志向,并且战胜学习道路上的重重困难险阻,奔着目标,

一往无前,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人格的力量是无敌的。儿童文学作家是为天真纯洁、可塑性强的儿童创造精神产品的特殊的人群,就更应该关注自己的人格、人品。文如其人,格调低下的作家决不可能写出格调高尚的作品。所以,作家在以自己的作品去影响读者、健全读者的人格之时,首先要注意塑造自己的人格。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最终目的是帮助儿童健康成长,使儿童在接受文学作品过程中,从思想道德、情感精神、心智人格等诸方面,受到感染影响和启发教育。

不过,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决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以认知为基础,以审美为中介,甚至不能完全弃绝娱乐的成分。也就是说,任何一篇作品,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美感功能、教育功能和认知功能,适合低龄儿童的作品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过分强调任何一种功能,忽视其他功能都是错误的。对于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认识自然也不例外。回顾上个世纪几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的地位时常被人过分夸大,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教育功能在儿童文学中也有其限定性,它不可能也无法代替其他功能。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若一味的用所谓教育去套,往往是捉襟见肘,牵强附会,时常陷于不能自圆其说、非常尴尬的境地。

儿童好奇、好热闹、好刺激,儿童在阅读作品时很少对人物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生动有趣是他们是否喜欢一个人物或一个故事的唯一标准。因此,以任溶溶为鼻祖,以郑渊洁为代表的热闹型童话,不管其思想价值、教育意义如何,多能对小读者构成强烈的吸引力。皮皮鲁是个有缺陷的问题孩子,舒克和贝塔在生活中是人类厌恶的小老鼠,但他们倍受小读者喜欢。还有《敏毫生奇游记》,几乎每个故事都写得非常荒唐,但小读者认同;明知现实生活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吸引了读者,对读者有说服力,好的童话大人小孩都喜欢。所谓好的

童话,若以《敏毫生奇游记》为蓝本,用教育性作为价值评判标准,那是没有结论的。再如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笨猫一次又一次地想捉弄老鼠,却每一次被老鼠捉弄。笨猫的自作聪明,老鼠的聪明机智能否印证所谓的“教育价值”呢?显然很勉强。至于形式上的不厌其烦的重复,内容上的猫鼠游戏,更难用教育这个筐去装。但它却能给儿童以快乐,让儿童开心,让儿童痴迷。这便是成功的好的儿童作品,尽管谈不上什么教育价值。

由此可见,文学并非只有教育作用,即便是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强调文学的教育价值未可厚非,但不能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更不能以教育性的一元取代审美性、娱乐性和认知性等的地位。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但不是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注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理所应当,但不能过分追求道义灌输和宣教功能,否则,儿童文学就有可能迷失本性。客观地说,教育性只是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机制中客观存在的属性之一,但它不是儿童文学的全部,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说到底仍是审美。

蒋风先生说:“要是过分强调教育性并把它理解得过分狭窄,就会导致作者刻意追求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某一教化的目的;这种作品容易流于说教,影响质量。但要是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教育’性束缚了作家的头脑,必须彻底摒弃‘教育性’,又等于抽掉了儿童文学的灵魂。儿童生活阅历浅,知识少,辨别能力弱,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不能不给予必要的引导。因此,任何否定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论调都是错误的。”[8]这样的论断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参考文献]

- [1] 潘菽.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2] 蒋风.儿童文学原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 [3][8] 蒋风.儿童文学:四十年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绪论[J].浙江师大学报,1991.
- [4] 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J].教育杂志,1921(11).
- [5] 《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记录[J].大众文艺,1930(4).
- [6] 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
- [7] 贺宜.小百花园丁杂说[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